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 今日 文坛

第二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 今日 文坛

第二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文坛. 第2辑 /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  
文艺理论家协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5  
(坚守与跨越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7930 - 5

I. 今… II. ①贵… ②贵…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91 号

坚守与跨越丛书

今日文坛第二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编

责任编辑 / 黄 瑛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220 千字

插 页 / 4

版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7930 - 5 / I · 1614

定 价 / 32.00 元

# 白雪版画作品

白雪：贵州省遵义市人，2003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贵州省文联。

2002年 参加全国大型当代艺术活动（行为艺术）《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

2002年 作品《飘零系列1》、《飘零系列2》入选“2002贵州省油画展”。

2003年 作品《飘零》、《飘雪》入选“贵州省第三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2003年 作品《意象》、《这一天 NO. 1》入选“当代版画学术探索展 2002 贵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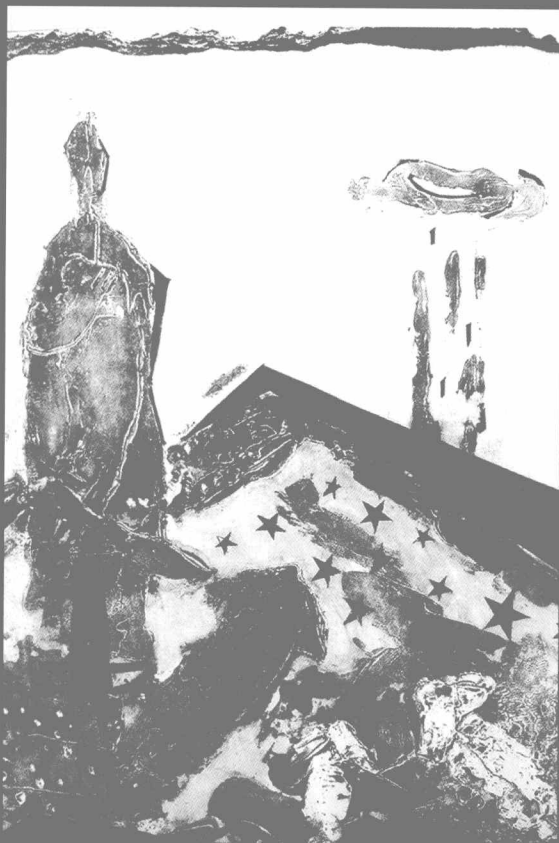
2003年 作品《飘零——寻》参加“第二届贵阳油画双年展”。

2005年 作品《这一天组画4幅》入选“第十七届全国版画展”。

2006年 作品《记忆——小树》参加城市零件——来自避暑之都的当代艺术联展。

2007年 作品《风景·梦》在“2007贵州版画艺术大展”中获铜奖。

2007年 作品《足迹》入选“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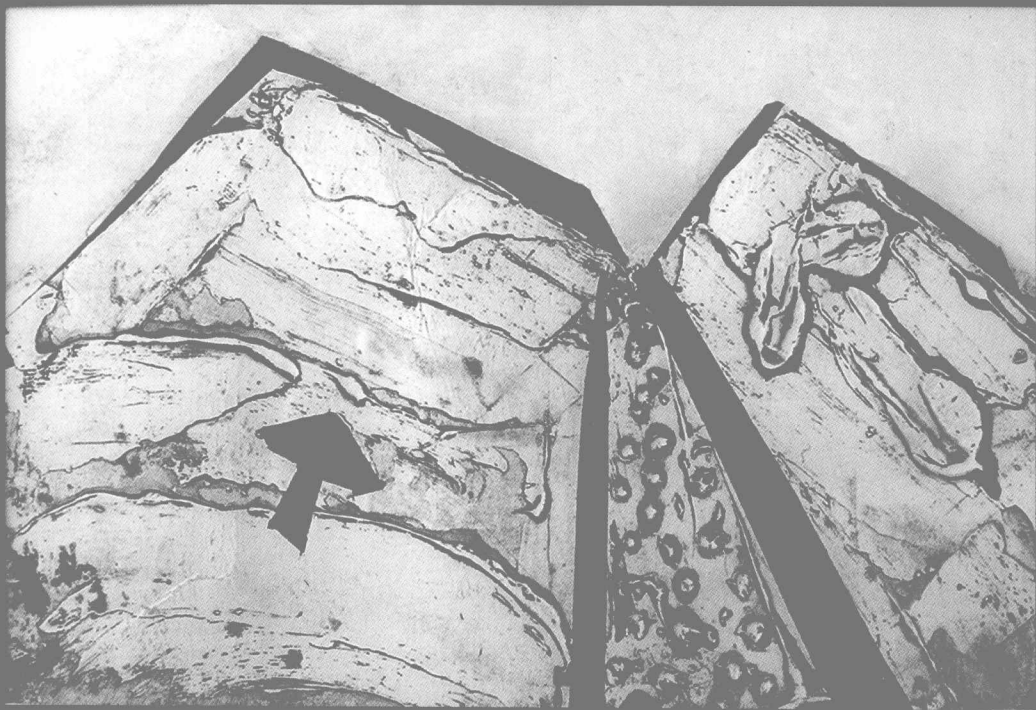
白雪版画作品《风景·梦》系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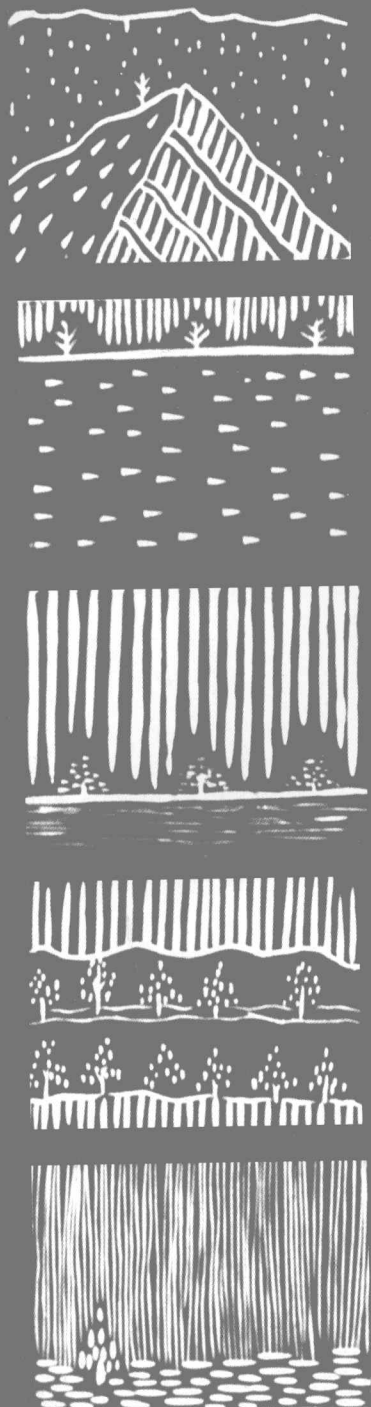
白雪版画作品《风景·梦》系列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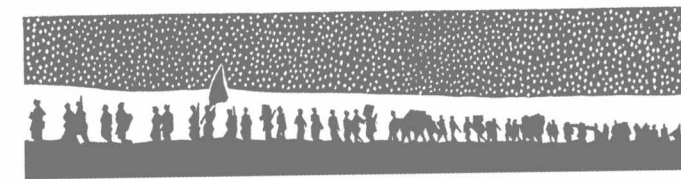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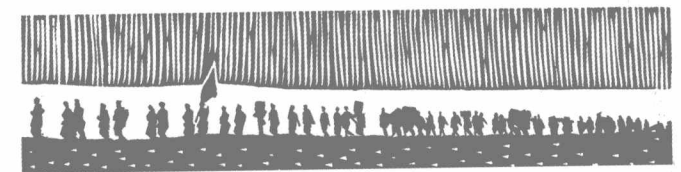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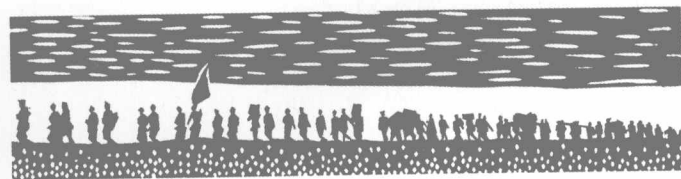
白雪版画作品《风景·忆》系列之一



白雪版画作品《风景·忆》系列之二



白雪版画作品《意象》（组画五幅）



白雪版画作品《足迹》



#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

---

主 编 / 何光渝

执行副主编 / 倪 明

书 眉 题 字 / 戴明贤

编 稿 / 陈 武

陈亚丹

白 雪

李 晶

# 目 录

## CONTENTS

贵州风俗的历史记忆

——追寻遮蔽在生活世界中的贵州历史细节

何光渝 1

世纪的相约

——从《走近黄果树大瀑布》到《多彩贵州风》

刘斯奇 17

贵州民族文学左右弹

罗吉万 35

新时期贵州民间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杨晓辉 42

贵州傩戏面具的保护和开发

顾朴光 65

“屯堡文化名片”

——贵州地戏起源重新探索

朱伟华 72

论傩文化的传播

吴太祥 94

贵州花灯艺术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印江土家花灯探微

刘 馨 100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与市场经济联姻的双赢模式初探

张贤智 107

浅谈贵州民族服饰的保护与发展

潘光芝 114

对黔东南苗族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美学思考

姚作舟 119

苗族女性婚恋的率性美

龙仙艳 140

“和”——侗族节日文化精神

王方奇 158

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仪式研究

——以贵州省一个布依族村庄的“三月三”的祭祀仪式为例

黄镇邦 172

布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的奇观

——以黔中黄连布依村为例

王星虎 181

白雪版画作品

白 雪 191

# 贵州风俗的历史记忆

## ——追寻遮蔽在生活世界中的贵州历史细节

何光渝

**【摘要】** 本文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布罗代尔的“整体历史”观念出发,以我国前辈史学家的研究实践为鉴,列举古旧文献中关于贵州风俗文化的一些记载和其中的历史细节,提出对民俗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见解,希望借此促进贵州历史研究与贵州民俗文化研究的互补互动。

**【关键词】** 历史 风俗 贵州细节

### 一、题解

写这样一个题目,是基于如下两点认识: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与我们的今天相关联的事物,都有一条或数条向后的、通向源头的道路。若是想要真正了解它们,我们往往不得不向后转身去“回头看”,探究它们的“根”;有的时候,它甚至会将我们带回到十分古远的、混沌的地方。二是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叙述的历史,不管叙述者是凡人还是圣人,不管叙述者是以历史的方式还是审美的方式,一旦进入言说,就都是在讲“一种可能性”;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也只是“那时候可能是那样的”。

#### 1—1:生活世界

毋庸讳言,许多历史细节,当然也包括贵州历史中的若干细节,早已被深深地遮蔽在“生活世界”之中。

我这里所说的“生活世界”，借用的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认为：“哲学的功能，不是揭示科学世界，而是揭示先于任何科学而存在的、作为整个‘客观认识’基础的‘生活世界’。”他说，生活世界是“作为唯一存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够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sup>①</sup>。

简单地说，生活世界是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它是人周围的世界、经验的世界和日常的世界。胡塞尔提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科学世界”而言的。在他看来，在近代科学体系建立之前，人们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都是“生活世界”。只是在近代科学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几何的和自然科学的数字化中被理念化了，这是一个“科学世界”；但是，在这个科学世界之外的，仍然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人类本来的世界，是人类世界的基本领域，也是任何客观认识的基础，是起点。对两个世界的这种认识，体现了人类的精神现象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科学世界”是专家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性的，“生活世界”是普通人的、具体直观的、生活性的。

在认识了“生活世界”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如今为何出现了多学科研究介入“生活世界”之中的现象。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学科如今都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生活世界”的。事实上，一片地域中人们过往的生活，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之根，总是一直活生生地保持在这样的“生活世界”中。比如，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名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中，我们就会读到贸易、航海、交通、货币流通、饮食、需求、价格、住宅、城市、时尚、日常生活的种种方面，这些正是这部历史巨著的主要角色。周谷城先生在《历史和人生》中也说过：“历史，就是民族的生活”，“把人的生活表现出来，反映出来”，就是文学；把“历史，或民族生活写出来，或口述出来”，就是历史。这是很有道理的。而在历时性的传统历史学中，以时间为坐标，沿着年月日的轨迹行进着；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叙述性——历史学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能够构成“事件”的那些“实际发生了的重大事情”，这一特征非常鲜明。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便成为帝王将相的编年史，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如经济、社会、文化等，则被过多地遗弃了。在这种线性叙述中，隐藏着

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历史发展的因果性。或许正因为如此,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才会试图摆脱旧史学所强调的纯政治史、纯制度史或“战役史”,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将历史研究引向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在布罗代尔的“新史学”中才特别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方法,并最终形成一种“共时性”研究取向的“整体的历史观”,从而为历史学带来革命性的贡献。

因此,从这一种认识出发,我相信,也特别希望,能够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回溯到民族平常的生活、平常的日子之中。我希望开始这样的尝试。我不敢说这样做是否有意义、有结果,但也许值得。当然,与正史中的“大”历史、“大传统”相比,这只是“小”历史、“小传统”。或许,什么也不算,不过就是一点点历史中的细节而已。

## 1—2: 风俗

风俗者,风气习俗之谓。按《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sup>②</sup>西汉大儒贾谊在《新论·风俗篇》又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可见中国古代对风(因自然生态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生存习尚)与俗(因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尚)的辨析已十分精到。风俗作为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大致包括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风俗、交通风俗、婚姻风俗、丧葬风俗、寿诞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交际风俗、经济生产风俗、娱乐风俗、宗教信仰风俗等。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像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征。

正因为如此,风俗文化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汉贾山在《至言》中说:“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sup>③</sup>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汉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曾下令要公卿大夫们把“广教化、美风俗”作为自己的职责。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史官往往将对风俗的考察与研究置于安邦治国的高度。很难想象,研究

中国历史文化而不重视甚至不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演变规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作为传统文化范畴,风俗的这种重要性,真是“前人之述备矣”。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说过:“……我对于古史研究的进行可以分三方面作叙述。其一,是考古学方面。其二,是辨证伪古史方面。其三,是民俗学方面……民俗学方面,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祀社神之集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辩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sup>④</sup>他以青年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民俗学的研究,早年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至今还很有名。他对民俗史料的使用,中国史学界也公认是一种开荒性质的工作,承认他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而民俗学家钟敬文则说:“……我们自幼学经史子集,子曰诗云,都是和‘史’沾边的。但那是上层阶级的历史和文学史,跟我后来搞的下层阶级的口承文艺和风俗史正相反。不过,今天回想起来,有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经历,也有一个难得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来总结治民俗学史对从事历史学工作的学术意义:它至少能填补以往历史研究中所留下的不少空白点吧……”<sup>⑤</sup>

现在的问题在于,能兼治历史与风俗文化的历史学者还很少见,尤其在我们多民族杂居的贵州。而这种治史的“多面手”,或者说“双料”的学者,无疑是为现代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所需要的。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贵州各民族的各种风俗,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贵州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史料往往过于注重伦理道德、精神生活,而对于当时生活的实际状况则记录很少。学者们一般也不愿去记录习以为常的东西,以致古代很丰富的日常生活史料中很少有直接反映。在这方面,贵州的情况大约也概莫能外。贵州古代“生活世界”的材料,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的典籍文献之中,必须有不厌其烦的仔细搜集、梳理,方能寻找出其中关于日常生活世风民俗的记载。研究贵州历史,不能完全脱离对风俗的研究;研究日常生活世风民俗,也十分需要采用历史的解释。

对历史持这样的认识,并从“生活世界”的世风民俗中寻找历史细节,并用以解释历史,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

且不说顾颉刚先生的皇皇巨著《古史辨》中的例证。1983年,白寿彝先生就曾以鲁迅、郑振铎和闻一多的研究为例,解说过类似的认识。鲁迅在1927年收入《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用吃“五石散”药的风气来说明魏晋名士们的风度,从少数人的癖好联系到流行相当长时期的社会风气,实际上就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解释历史,白寿彝说“可能这是近代人用民俗学的观点解释历史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论及1932年郑振铎先生的《涛祷篇》时,白寿彝先生特别引用了郑先生的一番话:“古书固不可尽信为真实。但也不可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愈是今人以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白寿彝还认为,闻一多先生用民俗学的观点去解释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所著的《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很有贡献,对中国古代传说与历史上的各种疑难,阐述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很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他很明确地说:“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sup>⑥</sup>

我相信白寿彝先生不是无端地以鲁、郑、闻三先生为例说这番话的。这很能启发我们对贵州历史上的复杂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兴趣,并且在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也可能引起贵州治史者们的进一步思考。从现在已经掌握到的民族学、风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材料来看,贵州历史研究的天地确还很广阔。至少,从上述三位前辈学者的研究实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学科对解决具体历史问题是有帮助的,可以让人们更多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注意到地区的、天然的条件差别,注意到历史的变化,注意到经济的、政治的力量与世风民俗变迁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更多地注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里,贵州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及其内部、不同经济文化地区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和融通。

广义的历史,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史等。广泛的历史现象,向来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中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世风民俗,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历史的发展促进风俗的演变,风俗的变化反映着历史的进程。这正

是“生活世界”中的“风俗”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把风俗定义为“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的话,这“世代传承、相沿成习”八个字便说明了民俗的历史性特征。风俗和“传统”一样,都有其相对静止、凝固的特性,在此时此刻,它们既体现了现实,又体现了历史。

《淮南子·齐俗训》中说得好:“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古代学者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 二、举要

在读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看到有这样的记叙:16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在对17世纪中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捡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布罗代尔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

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当然还是很不够充分、详尽的。但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很少有人考证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而这种研究在我看来,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也因此,我认为:从所能寻求到、阅读到的关于“风俗”的材料中,可以触摸祖先的日子——他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日常生活。对一个研究者来说,不应该也不可能了解全面的历史,因为任何人了解的历史,都只能是历史的一个概貌,或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片断。我只想了解,曾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祖先们,在政治、征战、制度、典章、国家等等之外,是怎样度过他们平平常常的日子的;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贵州“风俗”中积淀了“贵州人”这一群体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某些依然“古风遗存”的风俗形态何以能够保留至今,其中究竟有何历史的因果,如此等等。

### 2—1:文献

风俗研究与历史研究类似,多是凭借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进行探索。

这也可算是二者在研究材料上的一种共性。

就文献而言。贵州建省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而贵州的省界及省内各府州县界的确定,则是经清康熙两朝调整,直至乾隆时才得以基本完成。因此,研究完整的贵州风俗难度很大,主要是史料缺乏。许多风俗缺乏考古实证,不仅必须从文献资料中,同时还必须从民族学资料中吸取营养,相互印证,彼此补充,才有可能描述出风俗的来龙去脉。对贵州而言,在“本纪”、“世家”、“列传”及“礼乐志”、“地理志”、“舆服志”、“食货志”等正史中,与贵州相关的风俗史料可谓东鳞西爪;在贵州省及其各府、州、县的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中,才有一定分量的记载。但若追寻到风俗史的脉络,还必须旁及贵州建省之前相邻周边区域的相关材料。上述材料,即属于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圣贤文化”之列。而在这些“关于贵族方面的材料”中,“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就是记载地方情形的志书——省志、县志等——所标举的门类,如选举、仕宦、烈女、第宅、坟墓之类,又何尝不是为贵族作记载,为贵族的家谱作汇合的记载呢!”<sup>⑦</sup>因而更需要有来自民族学方面的支撑和补充,方不至于失之偏颇。这无疑增加了贵州风俗研究的难度。

也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来自“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正如近代风俗史学家张亮采所言:“或征之于言语,或征之于文字,或征之于历史地理,或征之于诗歌音乐等”,乃至“后世稗官野乘及一切私家著述”<sup>⑧</sup>。贵州今存的古旧文献中,古代不少野史稗乘及私家著述,各民族流传至今的各种民俗、宗教、文艺等方面的材料中,确实可以找到若干有关风俗文化的记载。当然,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它们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但这是一个贵州风俗史研究的资源宝库,当然也是贵州历史研究的资源宝库。

且不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宋史·蛮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古史中记载的贵州风俗。在古代不少稗官野乘及私家著述中,例如唐樊绰撰《蛮书》,宋朱辅撰《溪蛮丛笑》,宋宗懔撰《荆楚岁时记》等;明代,高拱撰《靖夷纪事》,徐宏祖撰《黔游日记》,江之春撰《安龙纪事》,田汝成撰《炎徼纪闻》,王轼著《平蛮录》,王士性撰《广志绎》、《黔志》,朱孟震撰《西南夷风土记》,萧其炎纂《夷俗记》,李化龙著《平播全书》,郭子章撰《黔

记》等；清代，田雯撰《古欢堂集》、《黔志》、《苗俗记》，贝青乔著《苗妓诗》，舒位著《黔苗竹枝词》，屈大均撰《安龙逸史》，陈鼎著《滇黔游记》、《滇黔土司婚礼记》，张澍撰《续黔书》，李宗昉著《黔记》，陆次云著《峒溪纤志》，檀萃撰《黔囊》、《说蛮》，方亨咸撰《苗俗纪闻》，毛奇龄撰《蛮司合志》，徐家干撰《苗疆闻见录》，黄元治著《黔中杂记》，吴振棫纂《黔语》，林溥撰《古州杂记》，杨宗瀛撰《都濡备乘》，韩超撰《苗变纪事》、《独山平匪日记》、《遵义平匪日记》，罗文彬、王秉恩撰《平黔纪略》，包汝楫撰《南中纪闻》，范兴华撰《啖影集》，爱必达撰《黔南识略》，罗绕典撰《黔南职方纪略》，蒋攸钰著《黔轺纪行集》，郑珍著《田居蚕室录辑逸》、《母教录》等；民国，野史氏撰《乌蒙秘闻》，胡朴安撰《中华风俗志》等，均记载了丰富的贵州风俗资料。

应该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用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风俗之外，在贵州民间，还活着更为丰富的口头民俗文化资料，包括各民族的古歌、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等。透过其扑朔迷离的外貌，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贵州远古初民所经历的生活风尚。

姑且列举一些看似最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

## 2—2:关于“食”

在今天黔东南、黔南两自治州的大多数地方，仍然流传着“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蹶蹶（读音 cuān）”的民谚。一般人都会理解为那里的人喜欢吃酸味食物，却不会想到这种饮食习惯与盐相关。贵州历来不产盐。《宋史》卷四百九十四记载：“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抚检使，答曰：蛮无他求，唯欲盐尔！”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七黎平府风俗中，也有侗人“不食盐酱，以草木灰汁腌鱼肉笋菜如鲐食之”的记载。明郭子章撰《黔记》中，载江进之的《黔中杂诗》，其中便有“鱼盐便是珍奇味”句。清乾隆《贵州通志·苗蛮》中记：“艰于盐，用蕨灰浸水。”清陈鼎著《滇黔土司婚礼记·序》中记：“滇黔薪粒价低而盐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终岁咽淡。”清田雯著《黔书·盐价》中写道：“（盐）又不可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值不得不昂，值昂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在《贵州通志·大定志稿》中，则记录了负盐者的艰辛：“故大定之民，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